

驱散职业病防治中的冷漠

想像一下,如果天下无贼,社会安定,警察大概可以下岗了;如果天下苍生健康平安,医生大概也没什么可干的了。然而,在社会治安状况还没有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前,警察队伍是万万少不得的。同样,在人们没有实现长命百岁、过上神仙日子之前,医生与医院还是要被十分倚重的。

在这种现实下,一家医院的倒闭就有了引人注目的意义——本报近日刊出通讯《职业病医院的倒闭与职业病患者无处求医的悖论》,介绍了南昌劳动医院这家曾经的“工伤医疗康复中心”的前世今生,也道出了当前一些地方职业病防治的两难困局。

医院倒闭,人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会不会由于经营不善、医技不高,就像古人调侃的那样“不明才主异,多故病人疏”?但是已经倒闭了一年的南昌劳动医院,偏偏不是这种情况,且恰恰相反。在某种“机制”之下,众多的职业病患者被人地挡在了医院门外。

在农民工张海超起而而险“开胸验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像张海超这样的职业病患者要得到诊断治疗,不得不迈过几个“高高的台阶”——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对

于无助的农民工来说,每一个台阶都高不可攀,况且还不能排除,有的台阶前会有人“暗使绊子”。

如果说张海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家表面光鲜的无良企业丑陋的一面,那么南昌这家职业病医院的倒闭,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某些人冷漠的一面。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有人对于创造了GDP的企业与企业家人,尽可能宽松、优惠;对于那些GDP的实际创造者的农民工等普通职工,则是能多苛刻就多苛刻。

我们曾经采访过因尘肺病患者集中死亡而形成的“寡妇乡”,面对正在濒死挣扎的

尘肺病患者,调查过在医院里住了30年、几乎是以院为家的尘肺病人。了解到的现实让我们也像是患了尘肺病一样压抑和窒息——这种职业病的最大特点是终身治疗但又终身无效。

相对于多数农民工对这一职业病的无知,比谁都明白这一疾病恶果的某些企业与机构,却仍在职业病的鉴定与治疗上设置高门槛,制造阻力,这已经不能单单用缺德无良来形容了,某些人的冷漠以及背后的制度漏洞,到了必须彻底治理的时候了。

而从制度入手,铲除容易诱发冷漠的制度因素,应该是努力的方向。眼下,正有一个极

好的机会,即《工伤保险条例》即将修改。不少业内人士注意到,此次条例修改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预防为主、康复优先、救助及时”的大方向,这无疑是职业病防治的一个佳音。

想那些在窒息中艰难求生的尘肺病人,我们的行动应该更快些。来自本报的最新消息说,全国范围的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即将启动,它由安监总局、卫生部、人社部联合推进,旨在全面治理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薄弱环节,改善工作场所作业环境,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保护从业人员的健康权益。职业病防治,我们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在行动。

□赵志疆

“板凳费”是看病难的真实缩影

“晚上宝宝发高烧、抽搐,从外地赶到武汉市儿童医院住院,却被告知没有病床,只能在走廊上坐板凳,而且还要收费”——据8月17日《长江商报》报道,记者调查后发现确有此事,每个板凳每天收费10元。

相较于“板凳费”的荒唐,我更关心的是:“板凳费”何以出现?大医院何以理直气壮地收取这项昧心钱?

无疑,“板凳费”出现的背景是医院人满为患、病床紧张,是医疗资源稀缺所致。那么,患者为什么热衷于大医院?一位患儿家长的话或许能说明问题:11个月大的儿子已经持续发烧20多天,虽然点滴不停地打,可就是不退烧,这才赶到了大医院。

很多专家学者不止一次地指出“看病难主要体现在大医院,而患者过于追求大医院正是其中关键所在”,但公众有自己的逻辑。不仅因为每个人都想尽可能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更为关键的是,很多人是在久治不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迎难而上”——当基层医院20多天尚且医治不好简单的发烧症状时,心急如焚的家长怎能不把大医院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当无数患儿因此走到一起时,大医院怎能不人满为患,由此使“趁火打劫”成为可能?

医疗机构正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大医院日渐壮大,人满为患,小医院日渐式微、门可罗雀。当“庸医大欺客”的大医院居高临下制定各种“宰客”举措时,小医院忙着通过制造各种噱头招徕生意。对于患者来说,无论是否直入大医院的“宰客”,还是被小医院当做“实验品”,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笔者相信,“板凳费”最终会取消,但“看病难”问题的有效缓解,则仍需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林琳

图说

□赵春青/画



各有所需

据《重庆晚报》报道,有网友近日发帖,分门别类举出中国人一生需要办的证件高达80个之多。对此,网友调侃说:“按现在这办证速度,最快一年一张计算的活,估计还没办完就可以直接领‘死亡证’了。”

调侃归调侃,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办那么多的证件呢?再者,当下靠办假证谋生群体的“蓬勃”发展,是否与我们需要办的证件太多有一定关系呢?

新闻观察

□舒圣祥

中国第一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近日出炉——据8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它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作为研究成果的《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首次披露了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北京、上海、广东分列前三。

此榜单一出,质疑声顿起。最让人困惑的是:一些人印象中的生态大省排名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排名却普遍遥遥领先,甚至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份地方GDP榜单。这说明,该课题组定义的“生态文明”与公众理解中的“生态文明”,有一定差距。

纵使该课题组按照自己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得出的最终排名数据是“准确的”,但课题组自己所认定的“生态文明”的定义是不是科学呢?能不能得到公认呢?在对何谓“生态文明”以及如何测算“生态文明水平”尚未经过任何形式的公开讨论和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突兀地拿出这样一份排名来,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定义“生态文明”呢?

该课题组将所谓“生态文明水平”简单等同于“生态效率”,即单位生态冲击所对应的

当心对“生态文明”的片面解读

经济产出,引用的是这样的计算公式:EEI=GDP/地区生态足迹。其中,生态足迹等于生产所消耗的所有资源和吸纳其废弃物所需要的有用土地的面积。显然,这样的“生态文明”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与GDP成正比的观念,只不过并不全面地考虑了一些环境因素而已。本人看来,其中不乏对“生态文明”的片面化理解。

“生态文明”提出之时,舆论普遍肯定其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纵向上延续,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

治文明在横向上共生。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倘若将生态文明解释为一个公式化的经济概念,并且与地方GDP高度同向关联,那么,所谓生态文明,充其量只是物质文明的一个附属概念而已。

生态文明的发达与否,无需也不能以物质文明的发达与否作为前提。可在现有公式下,只要GDP不上去,“生态文明”永远都别想上去。照这样理解,“生态文明”的提法还有多少意义?

圈点新闻

糊涂的抓捕

据《长江商报》报道,在上海特警近日开展的10年来最大规模抓捕行动中,仅银都路一处抓捕点,当天至少有6处房间被错误地破门而入,12人被错捕,30人被抓扰。

如果你在凌晨熟睡中被警察莫名其妙地“拜访”,并且手铐“伺候”,会做何感想?警察当然可以“情报有误”,但一次行动便错抓这么多人,好像说不过去。再讲,特警行动最忌讳打草惊蛇,错抓人的同时,会不会放跑了该抓的?

考博的代价

中央音乐学院70岁博导梁某向校方纪检部门坦白,其与一名考博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并收受10万元贿赂。最终该女学生未如愿上博。校方已取消该博导招生、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权利。

上艺校,要行贿,似乎成为一条潜规则。时下,生活中的潜规则似乎无处不在,找工作、谋学历、求升迁……大大小小的圈子都有潜规则。当它们潜伏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一旦它们因偶然事件浮出水面,有些人的面子实在不太好看。

新华社记者 黄冠

近年来,各地城管跌跌撞撞、左突右冲,“执法”中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组“大城管”改革意见一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城市综合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就该课题大纲自8月7日开始向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负责人近日称:“成立一个由市长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即大城管)势在必行。”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指出,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的关键点,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但是,“大城管”直接由市长负责掌管,能否杜绝

“大城管”能否破解城管“执法”难

城管“执法”中的暴力事件,仍需从长计议和实践检验。

200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明确将城市管理领域作为推进综合执法的主要领域。自此,城管综合执法近乎成为“综合执法”的代名词。城管的角色是代行执法权,属于权力的受委托者,然而在一些地方,城管只记得对小商贩简单粗暴“执法”,而忘记了在

现有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而,由小矛盾演化成大冲突,致使悲剧不断上演。

由市长掌管城管,可以预期的是,城管的权力将更大、效率将更高。但是,能否解决此前存在的城管与其他部门的交叉管理和执法边界模糊问题,仍是未知数。

由市长掌管城管,虽然解决了归属问题,但是,仍没有解决城管执法合法性的难题。在现有模式下,市长掌管城管,仍然免不了

了将相关权力层层分化、落实,最终直接面对摊贩和市民“执法”的,仍然是原来城管队员。如果思路不变、素质不变,那么市长掌管城管,与其他部门分管城管,又有何差别?

让城管获得更多民意支持,关键在于由谁来管理城管,而在于城管角色和职责的转变。依法设立城管,依法规范城管、依法监督城管,才能真正解决城管“执法”难题。(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杨连元

本报通讯员 武永娜 孟然

时代先锋

未了的心愿

——记解放军优秀档案专家刘义权(下)

“分配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可不甘心啊”

2006年4月,刘义权接到了退休的命令,他依依不舍离开工作岗位。这一年,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拉开序幕,解放军档案馆急需档案专家整理、鉴定馆藏的志愿军档案,刘义权被返聘担任这项工作,他二话没说,立即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的心里,永远想的是党和军队事业的需要。

刘义权每天都是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逐件逐字从档案中查找着朝鲜战争前后有关美军失踪人员的线索,一翻就是几个小时,一坐就是半天时间;有时,一天忙完了还看不全一件档案;天天面对这些枯燥的档案资料,看不上几分钟,就能让人眼睛酸胀不已。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伏案工作,让刘义权积劳成疾,实在太累了,他就围着办公桌转上几圈,再坐下来继续工作。

刘义权每天都是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逐件逐字从档案中查找着朝鲜战争前后有关美军失踪人员的线索,一翻就是几个小时,一坐就是半天时间;有时,一天忙完了还看不全一件档案;天天面对这些枯燥的档案资料,看不上几分钟,就能让人眼睛酸胀不已。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伏案工作,让刘义权积劳成疾,实在太累了,他就围着办公桌转上几圈,再坐下来继续工作。

繁忙的工作,使刘义权忽视了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病变信号,也一再延误去医院治疗。2008年9月,在领导和同事一再劝告下,刘义权终于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此时的刘义权,依然在担心自己手头的工作,怕其半途而废,他拖着检查结果报告,直接把病情告诉了领导,要求领导上替他保密。

刘义权诚恳而言:“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手头上的档案资料,关系到中美军事交流的大局,分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可不甘心啊!”

一周后,刘义权被送进了医院,手术之

前,他显得心事重重;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情,宽慰他说:“有病也干不好工作呀,还是先把病治好了再说!”

手术之后,刘义权还是惦记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化疗未到一个疗程,他就要去上班了,妻子坚决不同意。刘义权急了:“如果你不希望我倒下的话,那就让我上班吧,不要让我离开档案!”面对领导的劝阻,刘义权说:“只要我还没倒下,就要坚持工作;就是累死在岗位上也心甘情愿。再说,这批档案关系着大局呢,让我把任务完成吧!”

靠着一种理想信念支撑,靠着一付硬骨头板板御病魔,刘义权返回其所热爱的工作岗位,像往常一样,抓紧点滴时间查阅档案。到了今年3月间,刘义权的病情发展了,需要接受放疗,刘义权还是每天坚持工作到下午5点,才去医院接受治疗。

一组统计数字感人肺腑:解放军档案馆馆藏志愿军档案数十万件,由刘义权所负责的其中6万多件的查阅工作,至今已查完5万多件,目前,只剩下不到9000件还没有鉴定完。

就是这近9000件未竟的工作量,至今还是让他时时牵挂,他说,这是其未了的心愿。

“给家里干活还谈多少钱吗”

刘义权常说:“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自私自利就不配当个党员。”

刘义权在档案收集利用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他退休之后,地方上的一些单位找上门来了,要高薪聘用。时隔不久,解放军档案馆受领从志愿军档案中查找美军失踪人员线索的任务,考虑到刘义权熟悉档案业务,想返聘他负责此项工作。可是,由于经费紧张问题,

只能给刘义权数额不多的返聘费。领导觉得过意不去,征求他的意见,刘义权说:“我在馆里干了半辈子了,馆里就是我的家,给家里干活还谈多少钱吗?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干;啥也不用说了,我明天就来上班!”

刘义权一直坚持着革命气节,保持着军人本色,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十分严格。儿子职高毕业后,工作不好找,想与朋友合伙开酒吧,老父亲实地做人,你将来一定能干成大事。”父亲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时时激励着孩子不断进取;现在,刘义权的儿子已经在搞形象设计工作了,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了,这让同事们赞不绝口,也让刘义权倍感欣慰。

后来,由于经营不善,酒吧没有开下去,刘义权又鼓励儿子说:“做人比赚钱更为重要,赚了钱也不要紧,只要你踏踏实实干事,老老实实地做人,你将来一定能干成大事。”父亲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时时激励着孩子不断进取;现在,刘义权的儿子已经在搞形象设计工作了,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了,这让同事们赞不绝口,也让刘义权倍感欣慰。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在1952年5月至1960年6月间,我国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朝鲜签订了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中苏科技合作规模最大、内容最广、影响最深。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双边合作

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在20世纪50年代脍炙人口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感人故事。它问世以来,至今印数达1000多万册,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教育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这本书的主人公和作者,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当工人,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他带领工人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为前方部队制造急需的枪炮弹药。每当日伪军进攻根据地时,他就带领大家抬着机器打游击,只要有空就坚持生产,每次都按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一次,在修复前方急需的炮弹时,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4个指头,左腿膝盖被炸开,左眼水晶体被炸碎,几近失明。但是,他知道前方急需弹药,等不及痊愈就回到兵工厂。抗战期

间,他带领工人们研究改善武器装备,主持研制成功射程达540余米的枪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以及时时、踏火等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吴运铎奉命去大连建立引信厂并担任厂长。在一次试验弹药爆炸力的时候发生意外,他被炸得浑身是伤。在几个月的治疗中,他阅读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中得到鼓舞和激励;为了为伤后更好地工作,他努力学会了日文;当他能下地时,便请示领导买来化学药品和仪器,把病房变成实验室,研制成一种高效炸药。在战争年代,他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仍留有几十块弹片。他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冬,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在莫斯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听到了关于他的事迹,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苏联医生对这位“中国的保尔”十分热爱和崇敬。经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等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

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做出了重要贡献。离休之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多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教育广大群众。1991年5月,吴运铎在北京病逝。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在1952年5月至1960年6月间,我国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朝鲜签订了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中苏科技合作规模最大、内容最广、影响最深。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双边合作

开始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轨道。1958年1月18日,双方又签订协定,规定双方主要围绕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的16个方面122个重大科研项目共同开展科研工作。

此后,在这两个协定的基础上,两国科学院、高教部、农业科学院分别签订了对口合作议定书。此后,双边科技合作发展迅速,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科研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档案

中苏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署

开始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轨道。1958年1月18日,双方又签订协定,规定双方主要围绕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的16个方面122个重大科研项目共同开展科研工作。此后,在这两个协定的基础上,两国科学

人民英雄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